

【哲学研究】

试论苏武精神的儒学底蕴^{*}

苏振武

(宝鸡文理学院 哲学系, 陕西 宝鸡 721016)

〔摘 要〕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和民族英雄,苏武其精神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崇尚儒学的历史思潮的熏陶、苏武精神对儒家价值诉求的契合、苏武精神在儒学承载基础上的传播与弘扬,足以说明儒家思想是成就苏武精神的一个根本原因。

〔关键词〕 儒学; 苏武; 苏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3)05-0005-04

苏武是中国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和民族英雄,他受命出使匈奴羁留十九年,却始终持节操守、不辱使命,其英雄事迹和爱国气节震撼古今,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播和积淀,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苏武文化现象,熔铸为中华民族的一座道德丰碑。那么,苏武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又何以经久不衰?笔者认为,苏武精神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儒家思想的影响则是一个根本原因,本文试就儒学对苏武的影响做一分析阐述。

一、崇尚儒学的历史思潮主导了苏武的人生价值

苏武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是汉武帝推崇儒学并使之居于主导思想地位的时代,作为官宦子弟,苏武不可能摆脱这一历史思潮的影响,其所受教育自当以儒学为主。

汉武帝时代在治国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将儒学提升为封建正统思想。根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初期有两次招贤良文学,并于元朔五年创建太学,其目的均在于凸显儒学在巩固政权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建元元年(前 140)冬,汉武帝登基后首次诏举贤良。武帝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儒生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

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汉纪九》)元光元年(前 134),尊崇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完全可以依照自己意愿治理国家,又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再次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遂崇儒术,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令后学者有所统一”^[1](P128-130)]。元朔五年(前 124 年),汉武帝又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创建太学,以作为“教化之本原”,“养天下之士”,即以太学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才。

对于汉武帝何以要“尊儒”?是否“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学界和史书是有分歧的。

汉武帝为什么要“尊崇儒术”?学界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其依据有二:一是出自班固《汉书》:“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一是出自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第二种说法,认为汉武帝接受了王

^{*} 〔收稿日期〕2013-07-02

〔作者简介〕苏振武(1952-),陕西武功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臧的建议。其依据是《史记》,司马迁记载的汉武帝“尊儒”是因为王臧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史记·儒林列传》。王臧是汉武帝的儒学老师,教完后被免职,汉武帝“招贤良文学”时,王臧已回到汉武帝身边,所以“举贤良”应是出自王臧的教导。第三种说法,认为汉武帝自己要凸显儒学,教化臣民,加强封建皇权。

汉武帝是否因尊儒而“罢黜百家”呢?三部主要史书说法也不一。班固《汉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认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与此相左。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在尊儒术的同时,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实际上是“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司马迁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是同时代人,应当说,作为历史见证人,司马迁的看法应当是符合实际的。所谓“悉延百端之学”,是说汉武帝继承了汉初开明的文化思想政策,并没有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专制,但也不是各学派具有平等地位,而是对各学派分层次的加以兼用。尊儒术,是把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重法制,是把法家学说作为治国方略;此外又兼用各家。^{[2](P179)}事实上,汉武帝在宣扬儒学以教化臣民的同时,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权和显示皇威,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怀柔,在朝堂又用酷刑以约束大臣。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

但无论是独尊儒术,还是儒表法里、儒法并举、兼用各派,在“尊儒术”这一点上学界和史书是没有异议的。由于汉武帝“尊崇儒术”,这就为儒学取得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因而从汉武时代开始,儒学由子学一跃而成为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首次诏举贤良是在建元元年(前140),时年苏武出生。汉武帝再次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是在元光元年(前134),时年苏武六岁。汉武帝创建太学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时年苏武16岁,已经成为郎官(苏武因父荫为移中厩监,13岁入仕)。从中可以看出,苏武学习和成长的时代,正是汉武帝尊儒并使之成为经学的时代;特别是汉武帝大量使用儒家人才为官,又在长安兴办太学(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此期的太学虽然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

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助长民间积极向学和学儒的风气,成为儒学传播重要的推手。很明显,作为这一时代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人才,作为一名官宦子弟,苏武所学自然要合乎时代潮流,也要契合朝廷意愿,即在猎取诸子百家的同时,当以五经为本,必然深受儒家思想之熏陶。由此可见,儒家道德价值诉求主导着苏武的人生价值追求,儒学是苏武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二、苏武精神契合并体现了儒家道德价值诉求
儒家思想对苏武之熏陶,从苏武精神的实质上亦可得到充分证明:苏武精神契合并体现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诉求。

儒家伦理包括国格伦理和人格伦理两个层面,从道德价值诉求来看,国格伦理的价值指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人格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崇高人格和个人志节。而苏武精神的实质和特征,主要就表现在民族气节和个人志节两个方面,这与儒家的道德价值诉求十分契合。

在儒学发展史上,直到西汉时期才提出了“国格”观念,集中表现为董仲舒所讲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春秋繁露·竹林篇》),以及司马迁所讲的“忠臣不先身而后君”、“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等,都强调了一种忠君爱国思想。由于忠君为形,爱国为质,因而国格伦理的实际指向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苏武十分欣赏这些思想,也深受其影响,从而坚定了他对西汉王朝和大汉民族的忠心,成就了苏武在大节道义上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苏武出使匈奴,在得知副使张胜私下参与匈奴内部谋反事发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尊严,先后两次欲自杀以捍卫国家尊严。面对卫律的不公平审讯,他以“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表现出对汉朝的忠心。幽囚地窖,他决不放弃,啮雪咽旃,矢志不渝,以求完成使命。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期间,他始终“仗节牧羊,卧起操持”,因为这节杖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自身所负的使命,意味着苏武虽然人在北国,但却始终心系大汉。面对故友李陵言其兄长蒙冤被害,弟弟被逼服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等不幸,他断然答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汉书·苏武传》)简短的言辞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在苏武那

里,万物可变,汉家节义则生死相随,与日月同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儒家国格伦理思想对苏武影响至深,成就了苏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从儒家人格伦理的价值诉求来看,孔子和孟子提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孟子还进一步提出这种理想人格就是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这种“大丈夫”必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些思想对苏武人格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苏武也因此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典范。苏武的忠贞不屈,赢得了匈奴的崇敬,因而使出百般手段要苏武投降。先是以死相威胁,苏武却视死如归;又用高官厚禄女色来引诱,苏武却视其如流水浮云;再用饥饿来折磨,然而苏武却在地窖中啮雪咽旃,顽强求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后将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牧羝,企图以无望来逼降苏武,苏武却以最圣洁的信念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保全了生命,展现了汉朝使节的气节,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客观的讲,一个固守信念,一再坚拒利诱,无视威吓,且不畏死亡的人,已堪称不世出的人中之杰了;而能经得起长达十九年恶劣环境和孤独的煎熬、考验犹不改其志节,若非是具有超人毅力的“大丈夫”,其谁能之?而苏武却全做到了,无怪乎班固为苏武作传,于文末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汉书·苏武传》)可见,正是因为有儒家人格伦理的熏陶与支撑,苏武才能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显大丈夫人格,呈浩然之正气。也正是这种个人志节,支撑和实现着苏武的民族气节。如果没有个人气节,哪里还能谈得上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呢?

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信念和言行,当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深植于内心时,必然能蕴酿而升华成为一股无形的能量,这股能量,孟子称之为“气”。而一个人的“气”一旦蕴酿成功,定当转化为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持恒的毅力。^{[3](P34)}苏武壮年奉使北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十九年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移大志,很明显,应缘自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体悟与坚持,进而深化为强固的信仰,再升华而成为孟子所说的凛然“正气”。秉持着这种凛然“正气”,苏武自然也就展

现出其大无畏的精神,孕育出一股持恒而坚强无比的毅力,成就其千古不朽的志节。这就不难看出,正是儒家伦理铸就了苏武的忠国精神和人格风范。

三、苏武精神传播和弘扬以儒学为思想基础
儒家学说对苏武的影响,还可从苏武精神的广为传播和弘扬光大中得到证明。

两千多年来,苏武事迹的传播经久不衰,日益广泛,使苏武精神深入人心,弘扬光大,其深层次原因,除了救亡图存、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需求外,其与弘扬儒家价值诉求的需要相一致、以儒学为承载是一个根本原因。

历史上,从西汉宣帝时苏武图绘麒麟阁开始,以鸿雁传书、北海牧羊、苏武节等为题材,以诗词、歌曲、绘画、戏剧等为形式的歌颂苏武精神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苏武文化现象。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苏武魂销汉使前……陇上羊归塞草烟”(《苏武庙》)、南宋文天祥的《题苏武忠节图》三首、元末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到辛亥革命后脍炙人口《苏武牧羊词》等以诗词形式歌颂苏武精神的佳作;如童华池的《永远的苏武》、卓昊洋的《遥想苏武在匈奴》等以散文形式歌颂苏武精神的佳作;如明清时代陈子和、黄慎、任伯年等抒发对苏武的崇敬之意的《苏武牧羊图》绘画;如众多的歌颂苏武精神的戏剧;还如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小说、雕刻、电影、电视、歌曲、乐曲、铭文等,都是苏武文化的常见表现形式。

经过苏武文化的历史传播,苏武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已经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熔铸为一座道德丰碑。每当民族危难和民族复兴时期,苏武精神一直发挥着振奋国人民族精神,强化国人民族气节,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共赴国难的道德功能和价值导向。如历史上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等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的英雄壮举,以及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洵“贤者不想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志,无不受到苏武精神的感染和熏陶。而抗战时

期的《苏武牧羊》剧,则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日士气。改革开放以来,苏武文化的传播更趋强烈,如近几年研究和弘扬苏武精神的专著《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苏武精神与儒家伦理》的相继问世,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茂陵封侯》,河南豫剧二团创排的豫剧《苏武牧羊》,近期陕西歌舞剧院推出的原创歌剧《大汉苏武》等,对于唤醒国人的民族良知,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武精神不仅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而且在海外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历史上韩国和朝鲜的知识分子非常崇拜和敬仰苏武的为人;现代东南亚许多华人也因为苏武精神的感召和影响,而十分热衷于慈善事业,造福桑梓,奉献社会。

我们不禁要问:苏武事迹为什么能广为传播且经久不衰?苏武文化为什么能够得以生成且一枝独秀?苏武精神为什么能够持久的、广泛的发挥其感染和激励功能?答案是:除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外,其与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儒家学说价值诉求的一致性,是其得以传播和弘扬的深刻的思想基础。

蔡仁厚先生在论及“儒家学问的特质”时认为:“儒家学问重实践……所以,儒家之学应该是行为系统的学问……儒家重视所学的与所做的通而为一,所知的与所行的打成一片,因此主张学行合一,知行合一。”^{[4](P32)}这是符合儒学精神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重视理论上的阐述,更注重力行和体现,其实质上就是一种教人如何经由“伦理”的落实与“道德”的体现,来充实并圆融现实生活,光耀精神生命的无尚价值。其价值诉求表现在国格上,就是要求人们忠君爱国,“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其价值诉求表现在人格上,就是要求人们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凡是与这种价值诉求相一致的,就有其存在、发展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基础;凡是与这种价值诉求不一致的,就不是儒家所倡,就没有其

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土壤。苏武实质上是儒家道德价值诉求的典型体现,历史上苏武事迹的传播、苏武文化的弘扬、苏武精神的激励、教诲和感染功能,实质上是对儒家价值诉求的彰显,是对儒家文化的弘扬,与儒学的弘扬与发展需要具有极大地一致性。具体来说,宋元时期题苏武画像诗其所以繁盛,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宋元时期理学思想崇尚气节,而苏武则是其所追求的爱国楷模和人格典范,这些诗人都属于儒者,因而苏武这个典型就很自然的进入了他们的视野。^{[5](P357)}同样道理,苏武精神为什么在东亚和东南亚能够发生影响,也是因为这一地区恰恰在儒学圈内,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苏武精神的长期传播和发扬光大,恰恰是弘扬儒学所需要的,而苏武精神之所以能够得到彰显和弘扬,就是因为有儒家学说为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儒学对苏武精神传播弘扬的承载,再次验证了苏武精神乃儒家所倡,为儒学所铸。

综上所述,苏武精神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儒学的熏陶,苏武精神的实质与特征契合了儒家道德价值诉求,苏武精神的传播与弘扬以儒学为承载,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儒学铸就了苏武精神。

参考文献

- [1] 王子今. 秦汉史—帝国的建立[M]. 台湾:三民书局, 2009.
- [2] 王志杰. 汉武时代的文化遗产集粹[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8.
- [3] 方俊吉. 苏武所体现道德精神之时代价值[A]. 苏振武. 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4] 蔡仁厚. 孔孟荀哲学[M].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 1988. 转引自苏振武. 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王渭清. 宋元时期题苏武画像诗管窥[A]. 苏振武. 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许勇为)

On the Confucian Connotations of Su Wu Spirits

SU zhen-w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Baoji, Shaanxi 721016)

Abstract: As a remarkable Chinese diplomat and national hero in history, the formation of Su Wu Spirits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trend of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agreement between Su Wu Spirits and Confucian values and spread and promotion of Su Wu Spirits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ism show that Confucianism is a root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Su Wu Spirit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Su Wu; Su Wu Spirits.